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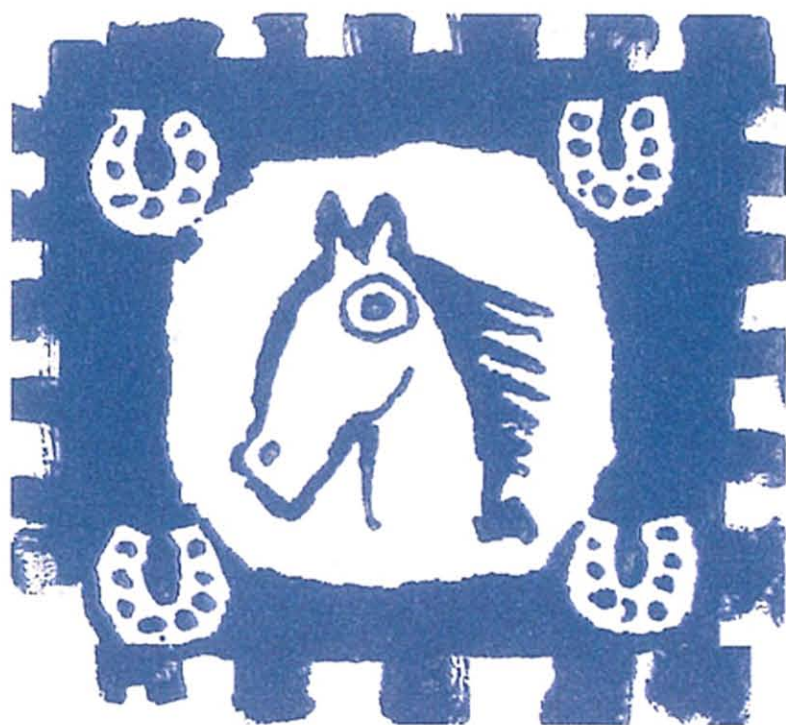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

主编：郭连厚 刘彪

执行主编：熊国章

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 马邑文化

李元庆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 \ 李元庆著 . 太原市：
三晋出版社 . 2011. 10

ISBN 9787545704303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主编：郭连厚 刘彪 执行主编：熊国章）

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

李元庆 著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 2011. 10

ISBN：9787545704303

定价：19.8 元

内容简介：今朔州市市委、市府所在地——朔城区，古称马邑。据朔州旧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大将蒙恬率秦军北击匈奴，在此筑城养马，故名马邑，因之名县，马邑之名始此。

目录

引言\1

一、马邑——北方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2

（一）匈奴族与马邑\2

（二）东胡鲜卑族与马邑\4

（三）突厥族与马邑\6

（四）肃慎女真族及蒙古族与马邑\10

二、马邑文化——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缩影\15

（一）春秋晋国“魏绛和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创举\15

（二）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民族文化双向融合的历史典范\18

（三）西汉“马邑之争”：胡、汉民族“和亲”历史开篇\22

（四）北魏“孝文改制”：民族文化全方位融合的历史丰碑\26

引言

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

马邑文化的主体特征是什么？为什么说马邑文化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缩影？两千多年来，马邑文化是如何伴随着古代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脚步，不断向前推进的？

眼前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为我们初步回答了上述一系列话题。

本书稿原题为《民族文化融合与马邑·马邑文化》，编入“马邑文化系列丛书”时，改题为《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并将页下注改为随文夹注，以求保持丛书版式风格的协调统一。同时还对原稿中存在的错讹字作了仔细校改。

本书作者李元庆（1934-2009），生前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6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毕业后留所从事科研工作。1978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建院于1983年），任哲学所所长。先生长期从事中国逻辑史、薛瑄与明代理学、三晋地域文化等学术研究，笔耕不辍，著述颇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晚年孜孜于“晋学”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大理论层次”研究，确乎别开生面，卓然而树大帜，且惠泽后学多多。记得2004年12月下旬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之际，先生先是托钟声扬会长给笔者转来了有先生亲笔签名的赠书《晋学初集》，接着又在大会当天中午宴席间，特意关切地询问了笔者于马邑文化研究的有关情况。尔后数年间彼此互通电话，先生还曾惠寄有关马文化方面的文献复印资料给笔者，而且应允为“马邑文化系列丛书”作序云云。其殷殷之情，令笔者毕生难忘。

哲人去矣，而其“晋学”永彰。

今代作小引于此，且遥致追思与告慰。

熊国章

2010年8月23日

一、马邑——北方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

（一）匈奴族与马邑

古代北方民族，战国秦汉以前有“戎狄”等各种称谓，戎狄是“西戎”和“北狄”的简称。我国古代民族最初分为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华夏族分布于中原地区，是主体，四周各民族合称“四夷”，西戎、北狄即泛指分布于我国西北、北方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简称戎狄。

战国秦汉以后，北方民族统称为“胡”，有所谓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之称。汉代以后，华夏民族又称汉民族，所以，汉以来的北方戎狄民族和中原华夏民族便分别称做“胡”、“汉”民族了。

古代北方民族的构成，一般被归纳为匈奴、东胡、肃慎、突厥、蒙古、氐羌等几个大的族系（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第11～13页，上海书店，1984年），各大族系也还有称谓不同的支族系。诸如：

“五胡”之一的羯族被认为是“匈奴别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应是匈奴族系的支系了。

东胡族系有乌桓、鲜卑两大支系。鲜卑又有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以及段氏、伏乞氏、秃发氏等分支。唐末五代建立契丹国后，辽国的契丹族被认为是“宇文之别种”（《魏书》，卷100，《库莫奚·契丹传》），又应是鲜卑宇文氏的分支或后裔了。

五代十国时建立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小朝廷的沙陀族属突厥族“别部”或“其后”（《新五代史》，卷4，《唐本纪·庄宗上》），亦应是突厥族系的分支或后裔了。

还有辽代末年建立大金国的女真族则是肃慎族系的后裔或分支，“女真”实为唐末五代契丹人对肃慎人的译称：“女真，古肃慎国也，番语讹为女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此番语即指契丹语。明末建立后金国后改国号为清、亡明后建立大清帝国的满洲族简称满族，又是女真族的直接后裔或分支。如此等等。

北方民族各大族系的原始居住地主要并不在山西，当然也不在马邑地区，而主要生活于蒙古大漠的草原生态环境中，“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史记·匈奴列传》），游牧放牧是其赖以谋生的基本手段，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一处水竭草枯，生业无着，遂游徙他处，在草原生态环境恶劣的形势下，往往轻骑南下中原内地，山西“表里山河”的山川地势便是北方民族南下的天然通道，马邑便是通道的重要驿站或口岸，被称作明长城三大著名关隘的所谓“外三关”，尤其是“两山夹峙，形势雄胜”的雁门关隘和“据险扼吭，屹为保障”的宁武关隘（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0，《山西二》），便是进入中原的北大门。

据文献记载，北方民族于夏、商时代就开始大规模南下了，至西周，他们中的某些部族已经深入到今山西南部、陕西泾水、渭水流域了（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就春秋战国以来的2000多年而言，今山西中北部便一直是北方民族各大族系迭相活动的集中场所，位于山西北部中间部位的马邑，便是北方各民族相继出演一幕幕活剧的历史舞台，秦代马邑古城诞生后，这一幕幕活剧更加威武雄壮，跌宕起伏了。

匈奴是我国最古老的北方民族之一。

据史籍记载：“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熏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晋书》，卷97，《四夷传·北狄·匈奴》），“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熏鬻”（《汉书》，

卷 94 上,《匈奴传上》)。说明匈奴族早在夏、商、西周乃至唐尧、虞舜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曾有过熏鬻、猃狁、鬼方、山戎以及土方、犬戎、翟或狄等多种族称,战国秦汉始称匈奴,亦称胡。如战国时“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史记·秦本纪》),便是匈奴称谓的最早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三胡”之胡,主要即是当时的匈奴,亦称胡。西汉时,匈奴单于遣使致书汉室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亦以“胡”自称。所谓“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是说匈奴属于我国古代五大民族集团之一的北狄民族集团,可说是北狄民族集团最古老的一个族系,因而是我国最古老的北方民族之一。

匈奴族的原始居住地,据史籍所载,“居于北蛮”(《史记·匈奴列传》),或者“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所谓“北蛮”或“北边”,其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晋书》,卷 97,《四夷传·北狄·匈奴》)。按这个空间界域,匈奴族的原始居住地“北蛮”或“北边”,也就是相当于以河套阴山南北为中心的蒙古大草原,这里是孕育匈奴族的历史摇篮。

匈奴与中原民族交往的历史悠长久远。《史记》有黄帝“北逐荤粥(熏鬻)”(《史记·匈奴列传》),《墨子》有尧“北教乎八狄”的记载(《墨子·节葬下》),说明早在古史传说的炎黄尧舜时代,匈奴先祖就开始与华夏民族接触了。商周时代接触更为频繁,匈奴的入侵曾对西周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周幽王便是在各路诸侯与当时称做“犬戎”的匈奴势力夹攻下被杀于骊山,西周宣告灭亡。春秋时期匈奴改称为狄或翟,又曰戎,故一般称戎狄。当时,戎狄与晋、齐、燕等华夏诸侯国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深入,波澜壮阔。

秦汉之际,匈奴势力达于极盛。秦二世胡亥元年(前 209),杀其父而自立的冒顿单于借楚汉相争、中原大乱之机迅速扩展了实力,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进而统一了我国北方,结束了北方有史以来“百有余戎”,“分散溪谷,自有君长……然莫能相一”的散乱局面,建立起强大的匈奴政权,形成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南、北两大民族政权鼎足对峙的政治格局(《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

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北匈奴自西汉以来接连遭受重创后“遂衰耗”,“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于和帝永元三年(91)被迫踏上了漫长的西迁欧洲之途。从此,活跃于我国北方整整三个世纪的强大的匈奴势力衰落下去了。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又三个多世纪,匈奴基本上与汉族融为一体,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存在了。

可以说,匈奴族的兴衰发展史就是一部匈、汉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关系史。在这漫漫历史长河中,山西大地以晋阳为中心的一座座文化古城如平城、马邑、平阳等,可以说便是出演匈奴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历史活剧的一座座舞台,那么,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便是在马邑古城的舞台上演出的。

下面即以秦汉之际马邑古城诞生和匈奴建立政权为标界,分前、后两段考察匈奴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以及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足迹。前段着重谈春秋战国时期,后段着重谈两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马邑古城诞生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分散溪谷,自有君长”的匈奴各部已频繁活动于这片土地,并与华夏族进行了广泛交往和文化交流。

春秋时期,主要是晋景公、晋悼公、晋平公时被称作戎或狄(翟)的匈奴部族的活动。

景公即位时,活动于上党太行山麓的“赤狄”各部严重威胁着晋国,于是景公接连发动了攻灭赤狄的战争,溃散后的赤狄部众被迫退至今山西北部与河北西北部,同当地部族相结合,被称作“山戎”、“北戎”或“代戎”、“代狄”,就是后来代国的前身。悼公时,山戎无终部被奉为盟主,并派使者与晋国缔约结盟,由此有了著称于史的“魏绛和戎”,晋与戎狄间保持了约 30 年的和睦相处。至平公时,随着晋国大规模向北扩展,和戎盟约被撕毁,于是晋国

在今太原附近的大卤“败无终及群狄”（《左传·昭公元年》），从此，无终各部被迫退至恒山以北今山西、河北交界地区，后在这一带建立起戎狄族的代国，故又称“代戎”或“代狄”，直至三家分晋之际代国被赵襄子消灭，历史进入战国时期。

可见，晋景公以来的春秋中后期，位于山西北部中间部位的今朔州一带，一直是匈奴先民无终各部族频繁活动的集中场所，是匈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战国时期，主要是赵国与“三胡”的关系以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三胡，即赵东北面的东胡、西北面的楼烦和林胡，他们主要也还是春秋时期匈奴先民戎狄部族的历史延续。当时，三胡骑兵的连连侵扰是赵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践成效之一就在于彻底击败了三胡势力，把夺得的土地置为雁门、云中、代三郡，大大扩展了赵国版图。雁门郡原主要为楼烦部族活动区，今朔州大地当时便属于雁门郡。

可见，在战国时期，这一带又是匈奴先民楼烦部族的活动场所，是匈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马邑古城诞生的秦汉之际，正值匈奴势力达于极盛，进而统一漠北建立国家政权之时，此后直至十六国战乱终结，环绕马邑古城的这片土地更成为匈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大舞台，进一步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西汉初年，马邑是匈汉争夺的战略前沿。高祖刘邦“白登之围”的惊险一幕，便是由镇守马邑的韩王信“亡走匈奴”事件引发的。之后，汉王朝被迫采取与匈奴“和亲”的退让政策，由此开了匈汉民族血统融合的历史先河。武帝时，拟设伏兵袭击匈奴的“马邑之谋”终因军机泄漏而流产，由此揭开了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的战幕，匈奴被迫远遁漠北，汉王朝扩大了疆域，打开了通往西域的要道。从此，号称“天之骄子”的匈奴再也难以骄横不可一世了。

东汉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漫漫西迁，南匈奴入驻今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晋北、冀北地区与汉民族交错杂居，马邑所在的雁门郡便是匈奴民族聚居和匈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集中场所。

魏晋时，南匈奴更进而内迁至今山西中北部忻州、汾阳、文水、祁县等地以及南部平阳一带了。西晋末年，建立汉国政权并由此拉开十六国战幕的刘渊，便是居于新兴（今忻州）的南匈奴后裔。

总之，在匈奴民族形成、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尤其是自马邑古城诞生至匈奴民族消亡的历史进程中，这个民族的足迹一直常常刻印在马邑这片土地上。

（二）东胡鲜卑族与马邑

东胡是乌桓与鲜卑的共同族称。按史家的说法：“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史记·匈奴列传》，《索隐》）东胡最初分布于匈奴所在的蒙古大漠以东，大体就在今河北、内蒙古和辽宁一带燕山地区。当时称匈奴为胡，匈奴之东即为东胡了。

东胡是我国又一最古老的北方民族族系，战国时期即已活跃于历史舞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三胡”，东胡即居其一。东胡主要是从东北面张家口外的无穷之门入侵赵国，终被赵武灵王击破。

西汉初，不断向蒙古高原拓展的东胡势力与匈奴发生冲突，被匈奴击败后分裂为乌桓、鲜卑两支，同受匈奴奴役。

乌桓于汉武帝破匈奴后归服于汉，势力日渐强大，东汉初又联结匈奴与汉为敌，东汉末终被曹操击灭，从此消失了。

鲜卑则于东汉前期北匈奴被迫西迁后“尽据匈奴故地”（《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在蒙古高原迅速壮大，成为继匈奴之后势力最强大的北方民族。东汉末年，鲜卑族分化为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以及段氏、乞伏氏、秃发氏等部族。

拓跋部族勃兴后，马邑之地又成为继匈奴而起的鲜卑民族频繁活动的集中场所，成为鲜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西晋末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入据晋阳后，其西、南有刘渊汉国，东有石勒，北有拓跋鲜卑，面对四境强敌虎视而力不足以抗击的险恶形势，刘琨为摆脱困境采取了联结拓跋、集中对付刘渊的战略方针。拓跋部的政治中心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盛乐，当时的首领为猗卢。永嘉四年（310），晋怀帝封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其为“代公”，猗卢以“封邑去国甚远，民不相接”为由（《魏书》，卷1，《序纪》），迫使晋室将雁门郡所辖陉岭（句注山或雁门山）以北的楼烦（今宁武）、马邑、阴馆（今代县）、繁峙（今应县）、崞（今浑源）等五县划归拓跋部，拓跋部由此入据马邑之地。晋愍帝建兴元年（313），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魏书》，卷1，《序纪》）。建兴三年（315）愍帝进封猗卢为“代王”，拓跋部由此建立以盛乐、平城（今大同）为南、北都的国家政权代国。东晋和帝咸康四年（338），什翼犍即代王位后拓跋势力空前壮大，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代国为前秦苻坚所灭，代民被分割为以黄河为界的河东、河西两部，拓跋部由此遭受空前劫难。太元十一年（386），淝水之战苻坚溃败后前秦瓦解，什翼犍之孙拓跋珪遂得以复代国号，即代王位，同年改国号为魏，称魏王，他就是北魏王朝开国君主道武帝。

太元二十一年（396），拓跋珪“始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即皇帝位。二年后的北魏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同时“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魏书》，卷2，《太祖纪》），制定京畿和郊甸的范围，正式建立以今大同为都城的强大封建王朝。其京畿范围是：“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魏书》，卷110，《食货志》）代郡即今河北蔚县与山西广灵县一带，善无在今右玉县南，阴馆在今朔城区东南，参合在今阳高县东北。这个范围大体相当于位于“陉北”或“雁北”的今大同、朔州两市辖属地带。就是说，北魏建都平城近一个世纪间，马邑作为京畿或京郊，又属于北魏王朝的腹心之地、政治中心所在地。

就是说，自晋愍帝建兴三年（315）拓跋猗卢入据马邑建立代国，至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拓跋珪迁都平城建北魏王朝，直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拓跋宏迁都洛阳，这约近两个世纪间，马邑遂由拓跋代国的发迹地进而成为北魏王朝的统治中心所在地。

自迁都洛阳至北魏分裂的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或者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在这40年左右，马邑又是北魏北部疆域恒州所辖之地。

自东魏立国至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北齐取代东魏，这十七八年间，马邑则是东魏肆州雁门郡所辖之地。

总之，自代国兴起到东魏灭亡，约近两个半世纪间，马邑始终是拓跋鲜卑活动的集中场所，是鲜汉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十六国战乱时期，马邑曾先后为鲜卑慕容氏前燕（337～370）和后燕（384～407）两个割据政权所占据，当时属于并州雁门郡马邑县县治。

北齐取代东魏后的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5），正式以今朔州之地建置朔州区划，称北朔州；天保八年（557），正式定马邑城为北朔州州治及其所辖广安郡郡治。北齐存在的27年间（551～578），北朔州作为“士卒骁勇”的“齐之重镇”（《资治通鉴》，卷173，《陈纪七》），有力维护了高氏集团的统治，并在北周灭北齐之战中，当高氏集团“巢穴”陪都晋阳和首都邺城相继失陷、北齐宣告灭亡之际，北朔州依然在顽强抗击北周。北周亡北齐后进而升北朔州为“总管府”，“置宫及六府官”（《资治通鉴》，卷173，《陈纪七》），治所仍设马邑。于是以马邑为治所的北朔州进而成为屯戍设防的北周重镇，直至三四年后（581）北周为隋文帝杨坚取而代之。

北齐高氏集团本系汉人，但“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卷 1，《神武纪上》），已经鲜卑化了，故北齐高氏政权实乃鲜卑化的政权，或者说已经是鲜卑族政权了。北周宇文氏为鲜卑族分支，其政权自然纯属鲜卑族政权了。这就是说，北齐存在的 27 年和北周灭北齐后的三四年间，以马邑为治所的北朔州和北朔州总管府，依然是鲜卑族活动的集中场所，是鲜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唐末五代，作为鲜卑宇文氏“别种”的契丹族又在北方崛起（《魏书》，卷 100，《库莫奚·契丹传》）。“别种”，是说契丹先祖于十六国时曾为宇文氏一支，唐末五代崛起的契丹族自然属于鲜卑宇文氏后裔了。

十六国时，作为宇文别种的还有库莫奚，当时同被慕容前燕开国君主慕容皝所破，流落于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以南和朝阳以北的松漠地区。北魏初年又为道武帝拓跋珪所破，由此形成两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于松漠地区东、西相邻而居。

唐王朝建立后，契丹与库莫奚同归服于唐，并受唐封赐，皆“赐李氏”（《新唐书》，卷 219，《北狄传·契丹·奚》）。唐末，“契丹方强”，库莫奚“举部役属”（《新唐书》，卷 219，《北狄传·契丹·奚》），从此被契丹奴役。五代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契丹主耶律阿保机“自称皇帝”（《资治通鉴》，卷 269，《后梁纪四》），正式建契丹国，他就是辽太祖；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也就是契丹主耶律德光支持石敬瑭灭后唐的第二年，契丹“更其国号大辽”（《新五代史》，卷 72，《四夷附录一·契丹》），改称大辽国，耶律德光便是辽太宗，他获得了石敬瑭出卖的幽云十六州，把契丹势力推向极盛。北宋王朝建立后，长期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便是契丹辽的连连大举入侵，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即都城开封为金兵围困的当年，契丹族辽国也亡于女真族金国了。第三年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宣告灭亡，宋室南迁。

石敬瑭出卖的 16 个州，4 个属今北京市辖，8 个属今河北省辖，其余 4 个除云州属今大同市辖外，应、寰、朔三州皆属今朔州市辖。从此，不但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山西北部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于是，在北宋与契丹辽频繁争战的一个半世纪，位于雁门山北麓的马邑，便成为宋、辽双方激烈对阵的战略前沿；应、寰、朔等州则被建置为辽五京道之一的西京道大同府所辖之朔州，并升朔州为“顺义军节度”、“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三”（《辽史》，卷 41，《地理志五》），成为辽国南部军事重镇。所以，在宋辽长期对峙的年代，马邑又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南下入侵的战略基地，是鲜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三）突厥族与马邑

突厥是继匈奴、东胡—鲜卑之后，于隋、唐、五代势力达于极盛的又一北方民族族系。这期间，突厥族曾先后建有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以及作为西突厥后裔的沙陀突厥所建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等国家政权。

下面着重谈隋末五代频繁活动于马邑地区的突厥各部族。

“突厥”一词最早见于有关西魏文帝大统八年（542）的记载：“每当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千里”（《周书》，卷 27，《宇文测传》）。说明北朝后期突厥已经南下入侵了。

关于突厥的族源、族称和发祥地，据说“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周书》，卷 50，《异域传下·突厥》），“盖古匈奴北部也”（《新唐书》，卷 215 上，《突厥传上》）。这是说突厥生息于匈奴故地以北的今阿尔泰山（金山）南麓、准葛尔盆地北部和南部草原地带，是以阿史那为姓的匈奴族别种，当时受柔然（茹茹）族奴役为其作铁工。因阿尔泰山形似头盔

（兜鍪）状，俗称“突厥”，遂以为族称。

突厥于北朝后期日益强大起来，西魏废帝元年（552），其首领土门“遂自号为伊利可汗”，正式建立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建立后，即“有凌轹中夏志”。当时正值北周、北齐对峙争斗，皆欲交结突厥“以为外援”，突厥则乘机从中渔利。伊利可汗的继位者木杆可汗曾与北周合兵“伐齐”，“度崆岭”，“攻齐主于晋阳”，“纵兵大掠而还”。木杆可汗的继位者他钵可汗“弥复骄傲”，以至当“齐人惧其寇掠”而“倾其府藏以给之”后，他竟得意地炫耀：“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耶。”足见当时的北周、北齐政局已在突厥摆布之下了。并且，从突厥“度崆岭”、“攻晋阳”看，当时马邑之地也已是突厥频繁活动的场所和南下入侵的重要道口了。（参见《周书》，卷 50，《异域传下·突厥》）

杨坚取代北周建隋朝后，扭转了受突厥摆布的局面。于是，对他钵可汗的继位者沙钵略可汗采取强硬态度，“待之甚薄”。同时，为抵御突厥入侵，“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构筑起坚固的军事防线。而继位后的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拥有“控弦士四十万”，其势正盛，于是会同反隋的北周残余势力“悉众来寇”。杨坚针锋相对，遣将北征，“出塞击之”，大败突厥。当时，适逢突厥遭大饥荒，既有内乱，又有外敌，无奈之下，沙钵略遣使求和，“请将部落度漠南”，并“请猎于恒、代之间”，向隋称臣纳贡，“于是，岁时贡献不绝”，成为隋王朝附属国。沙钵略死，都蓝可汗继位后，因与“居北方”的沙钵略之子突利可汗“有隙”，杨坚即欲借机“离间北狄”，遂以安义公主嫁突利为妻，由此引发了都蓝与突利“数相征伐”的内乱，突利降隋，与隋合兵共击都蓝。隋拜突利为“启民可汗”，“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即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之定襄郡筑建大利城作为启民可汗牙帐，并于安义公主卒后继以义成公主妻突利。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都蓝为其麾下所杀”，“其国大乱”，突厥汗国灭亡，突厥分裂。突利可汗在隋王朝扶植下建立东突厥汗国。从此，蒙古高原出现了东、西突厥汗国鼎足对峙的局面。（参见《北史》，卷 99，《突厥传》）

东突厥汗国与隋王朝长期和睦相处。启民死后，其子始毕可汗继位，“部众渐盛”。隋对突厥一贯采取分化离间之策。隋大业十一年（615），炀帝第三次巡幸山西前，大臣裴矩即“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而“献策分其势”，由此提出分化离间突厥的连环之策：先是，建议炀帝嫁宗女与始毕之弟叱吉设，并拜其为“南面可汗”，以离间其兄弟，但“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始毕却由此生出怨恨。进而，裴矩又提出，“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因此，只要除掉那班为可汗出谋划策的“尽皆桀黠”之“群胡”，自可收离间之效。于是选择了“尤多奸计，幸于始毕”的心腹谋臣史蜀胡悉“诱杀之”：假托马邑举办盛大互市交易，“天子大出珍物”，“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贪婪的胡悉信以为真，遂背着始毕“率其部众，尽驱六畜，星驰争进”赶来，被隋伏兵“诱而斩之”马邑城下，然后诬称胡悉“背叛，我当共杀”，以此“诏报始毕”，“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隋书》，卷 67，《裴矩传》），深知这是精心策划的离间之计，由此拒绝向隋朝贡。突厥与隋朝裂痕进一步加深，终于在大业十一年全面爆发了。

这年五月，炀帝第三次巡幸山西，“避暑汾阳宫”。八月，自汾阳宫北上抵雁门，“巡塞北”。始毕闻讯，“率骑数十万，谋袭乘舆”，大军围困雁门，炀帝面临灭顶之灾，魂不附体，幸有“义成公主遣使告变”，朝廷始得以调集援军，经双方激烈争战，九月，“突厥解围而去”（《隋书》，卷 4，《炀帝纪下》），炀帝免遭厄运。从此，突厥对隋“朝贡遂绝”，与隋公开决裂，并于第二年“复寇马邑”，进而乘“隋末乱离”，“遂大强盛”（《北史》，卷 99，《突厥传》），对隋、唐王朝构成严重威胁，由此引发了隋末唐初抵御突厥入侵的大规模战争。这期间，马邑更处于隋唐抵御突厥和唐王朝大举攻灭突厥的战略前沿。

大业十一年（615），炀帝幸汾阳宫，拜唐国公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旧唐书》，卷 1，《高祖纪》），统领太原兵马。炀帝被围困雁门后，幸“赖太原兵马”“声势继进，故得解围”；次年始毕“复寇马邑”，李渊奉诏“率太原部兵马与郡守王仁恭北备边朔”，在众寡不

敌之势下巧设伏兵“击而大破”突厥（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大业十三年（617），炀帝南下“幸江都宫”，诏命“李渊为太原留守”（《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当突厥连连“数侵马邑”，李渊副将高君雅、马邑郡守王仁恭“为突厥所败”后，炀帝即遣使拘执李渊，迫使李渊“雄断英谟，从此遂定”起兵反隋大计（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亦由此拉开了唐初以马邑为战略要地大举攻灭东突厥汗国的战幕。

李渊于大业十三年七月起兵晋阳反隋，当年二月，马邑人刘武周杀郡守王仁恭宣布起事，在突厥势力扶植下攻城略地，占据了晋北大地，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新唐书》、《旧唐书》，卷86、卷55，《刘武周传》），自称皇帝，建立割据政权。唐王朝建都长安后的高祖武德二年（619），刘武周与突厥合兵“入句注，将侵太原”（《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随之攻陷晋阳城。这年，始毕可汗“病死”，处罗可汗继位；次年处罗死，颉利可汗继之。颉利时，“兵马强盛，有凭凌中国之志”（《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更大规模南下入侵：武德四年（621），接连“寇汾阳”、“寇石州”、“寇雁门”、“寇并州”、“寇代州”、“进围崞县”，复“寇并州”（《资治通鉴》，卷189，《唐纪四》）。武德六年（623），唐王朝首次收复马邑后，原为刘武周“守朔州”的范君璋“复引突厥来攻马邑”，唐“朔州总管”、“荣国公”高满政战死，“君璋尽杀其党而去”，进而又“与突厥合军寇太原之北境”（《旧唐书》，卷86，《刘武周传》）。直至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出马邑北上，乘其不备，“夜袭定襄，破之”，进而“战于白道，大破之”，再进而“破颉利可汗于阴山”（《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最后追堵颉利至磧口，颉利被擒，东突厥汗国灭亡。

再说西突厥汗国。都蓝可汗被杀、突厥汗国亡后，其西部势力达头可汗“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而建西突厥（《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因“西突厥由东突厥分出，居于东突厥之西故名”（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第26页，上海书店，1984年）。东、西突厥分立，东突厥启民可汗归服于隋，西突厥继续与隋为敌。唐高祖武德二年（619），统叶护继立为西突厥可汗。统叶“勇而有谋，战辄胜”，由此“控弦数十万”，“遂霸西域诸国”，势力达于极盛。唐太宗贞观二年（628），统叶为其伯父所杀，从此内乱不已，衰弱下来。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大将苏定方擒获突厥反叛头目阿史那贺鲁，“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西突厥汗国灭亡。

后突厥汗国是颉利被擒、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其余众来到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唐太宗“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从此归服唐王朝。唐高宗永淳元年（682），颉利族人阿史那骨咄（笃）禄等纠集余部据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反唐，“自立为可汗”，称颉跌利施可汗，建立后突厥汗国，进而“攻并州”、“掠定州”、“攻妫州”、“攻蔚州”、“连寇朔、代”，“复入朔州地”（《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屡屡侵扰唐王朝。武则天天授二年（691），骨咄禄死，其弟默啜“自立为可汗”，“默啜负胜轻中国，有骄志”，势力达于极盛，“岁入边，戍兵不得休”，“俄复盗边”，“攻石岭”、“围并州”、“入代、忻”（《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侵扰进一步加剧。总之，“突厥默啜可汗自武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至唐玄宗开元四年（716），默啜年老昏聩，连年战争，导致内部混乱，众叛亲离，默啜在内乱中被杀，后突厥汗国崩溃，不久即告灭亡了。

沙陀突厥作为西突厥后裔或“别部”，其族号“沙陀”，据说源自“大磧”，“磧”本义为浅水中的砂石，引申为沙漠。“盖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阳，蒲类海之东，自处月以来居此磧，号沙陀突厥”（《新五代史》，卷4，《唐本纪·庄宗上》），意谓居于大沙漠的突厥。

沙陀突厥入居内地始于唐王朝中后期宪宗年间（806～820）。

首先是建立后唐小朝廷的李克用宗族。“李氏之先，盖出于西突厥，本号朱邪，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邪为姓”，“朱邪者，处月别部之号耳”（《新五代史》，卷4，《唐本纪·庄宗上》）。“朱邪”、“处月”，实即同音异译，皆可谓沙陀之姓，亦皆可谓沙陀之族号。就是说，

沙陀原本是西突厥处月部的一支或称“别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叛乱，高宗遣将征讨，意在“专诛贺鲁”，对处月等部不问，但处月首领朱邪孤注却“引兵附贼”（《新唐书》，卷 215，《突厥传上》），同贺鲁合兵攻唐军，战败后被唐将斩首。至唐宪宗时，“有朱邪尽忠及子执宜见于中国，而自号沙陀”，“执宜死，其子曰赤心”，“始赐姓李氏”（《新五代史》，卷 4，《唐本纪·庄宗上》）。这里，尽忠即李克用曾祖，执宜其祖，赤心其父。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尽忠与执宜“东走”归唐途中，“尽忠战死，执宜独走归唐”，后“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新五代史》，卷 4，《唐本纪·庄宗上》），在今朔州市所辖应县境落户。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李克用即“生于神武川之新城”（《旧五代史》，卷 25，《唐本纪·武皇纪上》）。

唐懿宗咸通十年（869），赤心受封“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并以其战功，授予“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国昌”（《新五代史》，卷 4，《唐本纪·庄宗上》），从此改姓李氏。此时，沙陀势力异常强大，“而国昌恃功益横恣，懿宗患之”。为防后患，懿宗于咸通十三年（872）改授“国昌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并授“尤喜骑射”的其子李克用为“云州守捉使”，而“国昌称疾拒命”，开始与唐王朝相抗衡了。随之，“克用乃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进而于岚州击溃奉命前来征讨的振武军节度使卢简方，“由是沙陀侵掠代北为边患矣”。无奈，唐僖宗乾符元年（874），“拜克用大同军防御使”。但是，当李国昌出兵征讨党项时，其老巢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被吐谷浑赫连铎乘虚攻陷，沙陀举族被俘。克用遂急从定边军（今陕北吴旗）接迎国昌返归云州（今大同市），被云州守将“闭关拒之”。于是克用父子攻掠蔚、朔间，“国昌入保蔚州，克用还据新城”，进而“破遮虏军（今五寨），又破岢岚军（今岢岚），而唐兵数败，沙陀由此益炽，北据蔚、朔，南侵忻、代、岚、石，至于太谷焉”，严重威胁唐王朝。僖宗广明元年（880），克用父子盘踞的蔚、朔之地被唐军攻破，“沙陀大溃，克用父子亡于鞑靼”（《新五代史》，卷 4，《唐本纪·庄宗上》），沙陀势力遭受严重挫败。

第二年，即僖宗中和元年（881），唐朝京师长安被黄巢军攻陷，朝廷又不得不起用李克用：“沙陀非克用不可将”，于是授克用“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率军镇压黄巢。中和二年（882），黄巢军败，“京师平”，遂以镇压黄巢“克用功第一”拜“河东节度使”；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复拜克用河东节度使”；昭宗景福二年（893），“拜克用‘忠正平难功臣’，封晋王”（《新五代史》，卷 4，《唐本纪·庄宗上》）。从此，李克用坐镇晋阳，统领河东，形成割据一方的强藩势力。

唐哀帝天佑四年（907），黄巢军叛首朱全忠于吞灭唐末众多割据势力后，初步统一黄河流域，遂以开封为都建立后梁小朝廷，唐王朝宣告灭亡，中国历史又一度步入大分裂、大动荡的五代战乱时期。从此，立足晋阳的唐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沙陀势力同建都开封的后梁割据政权夹河对峙，展开了惨烈的藩镇争夺战，也由此拉开了五代战乱的战幕。次年（908），李克用死，其子李存勖袭爵晋王。又 15 年后（923），李存勖终于渡河灭掉后梁，以洛阳为都建立后唐小朝廷，他便是后唐开国君主庄宗。后唐基业主要是出任唐河东节度使、进封晋王的李克用奠定的。

后唐政权的建立，开启了沙陀突厥走马灯式地迭相割据北方黄河流域的历史。

后唐维持了 14 个年头（923~936），即亡于建都开封的后晋高祖石敬瑭。石敬瑭家庭同属西突厥后裔沙陀部。据载，其四代祖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9~819）随李克用先祖朱邪氏“归唐”，曾“以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其父“善骑射，有经远大略”，随从“起于云、朔之间”的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累立战功”，官至“平、洛二州刺史”。石敬瑭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生于太原汾阳里”，但不知其姓石氏始由。石敬瑭亦以其“善射”而深为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所倚重，受封“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赐予“竭诚匡运宁国功臣”爵号（《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卷 8、卷 75，《晋本纪·高祖》、《晋书·高祖纪一》），由此

坐镇晋阳，统领河东，扩展实力，至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63），终于在契丹辽扶植下于晋阳称帝，进而南下渡河消灭后唐，以开封为都建立五代又一沙陀割据政权后晋小朝廷。

后晋维持了 11 个年头（936~946），即亡于契丹辽国，辽兵仓皇北撤后，即由建都开封的后汉高祖刘知远取而代之。刘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后世居于太原”，唐昭宗乾宁二年（895）知远于太原出生。后唐年间，刘知远与石敬瑭俱事明宗李嗣源“为偏将”，在后唐灭后梁之战中，知远对李嗣源和石敬瑭皆有“护援”之功，石敬瑭出任后唐北京留守时，即以知远“前有护援之力，奉移麾下，署为牙门都校”，倚以心腹。石敬瑭称帝后，知远更以“有佐命功”而“拜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卷 10、卷 99，《汉本纪·高祖》、《汉书·高祖纪上》）。至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末，辽兵攻陷开封，灭亡后晋，次年（947）初，辽主入开封，“改晋国为大辽国”（《新五代史》，卷 72，《四夷附录一·契丹》），随之俘虏出帝仓皇北撤，中原空虚，刘知远遂乘机称帝晋阳，进而南下取代后晋，以开封为都建立第三个沙陀割据政权后汉小朝廷。

后汉仅 4 个年头（947~950）的短暂年祚即为建都开封的后周太祖郭威所取代。后周维持了 10 个年头（951~960），又为北宋太祖赵匡胤取而代之，五代历史由此告终。

然而，郭威称帝建后周的同年（951），时任后汉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堂弟刘崇亦以晋阳为都称帝建北汉。北汉虽被纳入“十国”之列，即是五代刘氏后汉政权的实际延伸，可谓当时割据北方一隅的第四个沙陀小朝廷。北汉与后周对峙 10 年，北宋建立后又负隅顽抗 19 年而亡，由兴而亡先后 29 个年头（951~979）。北汉灭亡后，持续约一个世纪的唐末五代十国战乱的历史始告终结。

综上所述，自唐宪宗时李克用曾祖朱邪尽忠、其祖朱邪执宜始“见于中国”，进而尽忠“战死”，执宜“归唐”，“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今朔州即成为唐末沙陀突厥的集聚中心；再进而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北据蔚、朔”，“南侵忻、代”，这里又是沙陀突厥扩展实力的战略基地；再进而李克用受封唐河东节度使，进封晋王，由此坐镇晋阳，统领河东，形成割据一方的乱世强藩，直至克用之子李存勖入据中原，建立后唐小朝廷，这里即先后成为晋王和后唐所辖朔州区划以及振武节度使驻地。自石敬瑭称帝建后晋的天福元年（936），以幽、云十六州出卖契丹后，包括应、寰、朔在内的今朔州之地虽长期陷入契丹辽，不再为刘氏后汉和北汉两个沙陀小朝廷所拥有了，然而，自沙陀突厥入居神武川之后，沙陀部族及其与汉民族频繁交往与文化交流的一幕幕历史活剧，却是从这里登台揭幕开演的。

（四）肃慎女真族及蒙古族与马邑

其一，关于肃慎及其后裔女真族。

肃慎又名息慎，也是最古老的北方民族之一。“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方之大国也，一名息慎”（《竹书纪年一》，《五帝纪》）。据记载，虞舜时曾有“息慎氏来朝贡弓矢”（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西周时，“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柴伯作《贿息慎之命》”（《史记·周本纪》），“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可见自虞舜以来，居住于“东北方”的肃慎国即臣服于中原华夏王朝，并属于其所辖疆域的“北土”了。

古肃慎族大体分布在今长白山与黑龙江一带的白山黑水间，属于古老的东北民族。数千年来，肃慎族演变为众多不同的支系。这里只谈辽代末年建立大金国的肃慎后裔女真族在今朔州地区的活动。

“女真”实为唐末五代契丹人对肃慎人的译称：“女真，古肃慎国也，番语讹为女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3）此番语即指契丹语。后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而改称

“女直”。契丹辽兴起后，女真人被编入辽籍，称“熟女真”，未入辽籍者为“生女真”，是女真人的主体，完颜部又是其核心。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后，以今哈尔滨之南的会宁府为都（后改称上京）“即皇帝位”，“国号大金”（《金史》，卷2，《太祖纪》），正式建立大金国，是为金太祖。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金灭辽，天会五年（1127）灭北宋。由此形成以淮河为界与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直至金哀宗完颜宁绪天兴三年（1234）亡于蒙古族与南宋。

在金灭北宋之战中，朔州曾是金兵南下的必须逾越的重要战略环节，宋军曾在这里进行了悲壮惨烈的保卫战。

当时，辽国衰亡，金国勃起，北宋曾与金签约合兵灭辽，以图收复“所有五代以后陷没”的幽云十六州等“旧汉地及汉民”，于是徽宗宣和二年（1119）遣赵良嗣使金，双方签订“发兵相应”，“夹攻契丹”，宋“取燕京旧地”之约，约明年同举（《续资治通鉴》，卷93，《宋纪九十三》），第二年同时举兵。签约之后，宋迟迟按兵不动，金于攻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后，追击辽天祚帝于西京大同府，入据大同。其间，宋两次攻燕京（故幽州）不克，辽入据大同后进而直捣燕京，燕京城破，“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为金人席卷而东”，宋“所得者空城而已”（《续资治通鉴》，卷95，《宋纪九十五》）。燕京及其所辖州至此归宋了。关于西京大同及其所辖州之归属，金“百僚军人等都不肯许西京，惟是皇帝（太祖）要与贵朝永远交好，特许西京地土并民户”（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然而随着太祖死，继位的太宗只应允归还西京所辖八州中的武（今神池）、朔二州。

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辽平州（今河北卢龙）宋将张觉（彀）降金后复叛金归宋，是导致金兵大举南下灭宋的导火线。张觉降金后，金改“平州为南京，觉为留守”。复归宋后，“宋建平州为泰宁军，以觉为节度使”。金将宗望（斡离不）败张觉后，觉“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逼宋索还觉，宋“乃斩貌类觉者一人当之”，被宗望识破，宋不得已，“遂斩觉函其首以与金人”（《金史》，卷133，《叛臣传·张觉》）。“自是降将率解体，而金卒用此为兵端云”（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3，《复燕云》），即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南侵。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诏诸将南伐”，兵分两路进击北宋：西路以宗翰（粘罕）为主将，“自西京（大同）入太原”；东路以宗望（斡离不）为主将，“自南京（平州）入燕山”（《续资治通鉴》，卷95，《宋纪九十五》）。两路大军拟于宋都开封会师。

东路军长驱直入河北大平原，至年底逼近开封城下，待西路军到来，合围总攻。

西路军南下后，宋“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实勇悍可用”，这些勇武剽悍的边塞汉儿组成的“义胜军”，仅在河东者即达10余万人，由官府发放给养，战斗力极强。但毕竟属于乌合之众，不久，即因给养不足，由饥而怨，遂生叛意。及金兵南下至朔州，宋将孙翊奋起抗击，“出与之战”，胜负未决之际，汉儿们即“开门献于金”，朔州保卫战失败。金兵至武州“汉儿亦为内应，遂失朔、武”（《续资治通鉴》，卷95，《宋纪九十五》）。朔、武二州失陷后，“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咽喉全晋”，“与云、朔利害相等”的唇齿要地“代州”，以及“延袤千里，分为三路”的中路宁武关、东路雁门关、西路偏头关等长城关隘已经无险可守（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40，《山西二》），进入中原的北大门被打开了。于是，金兵长驱至代州，守将李嗣本“率兵相拒”，奋起抗击，“汉儿又擒嗣本以降，遂破代州”。及至忻州，守将贺正人索性“开门张乐以迓之”（《续资治通鉴》，卷96，《宋纪九十六》），城门大敞，奏乐迎迓了。朔、武、代、忻四州失陷后，金兵即得以顺利向太原进逼。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宗翰围太原府”；第二年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九月，“金人破太原府”（《续资治通鉴》，卷97，《宋纪九十七》）。这八九个月，太原知府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率领太原军民同金兵展开了悲壮惨烈的争夺战，虽然，太原终被攻陷，张孝纯被俘，王禀殉国，却有力牵制了金人灭宋的战略步伐。但是，“义胜军”边塞汉儿临阵叛降，

朔、武等战略要塞失守，已经为金人攻陷太原进而南下灭宋打开了门户，扫除了障碍。

金灭北宋，金人统治北方黄河流域后，改辽之西京道为西京路，辖大同、德兴二府，路治大同，今朔州地区之朔、武、应等州即为德兴府辖地了（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17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从此，这里又是肃慎后裔女真族及其与汉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其二，关于蒙古族。

蒙古族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后起的北方民族。说古老，因为它的族源可追溯至唐代；说后起，因为自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后，“即皇帝位”，“号曰成吉思汗皇帝”（《元史》，卷1，《太祖纪》），建立蒙古汗国，他便是蒙古太祖，从此，蒙古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至蒙古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曰大元”后（《元史》，卷7，《世祖纪四》），蒙古汗国遂称大元帝国或元蒙王朝了。

关于蒙古族的族源，有说“蒙古族起源于东胡”，东胡后裔之“室韦——达怛人，即没有经过突厥化的原蒙古人”，是“形成蒙古族的核心部落”（张碧波等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第36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他们原居于今内蒙古与东北三省间，后逐步西迁至蒙古高原，至南宋时崛起，建立蒙古汗国，形成蒙古民族；也有说蒙古族实为“匈奴、东胡、突厥等先住民族之混合的产物”（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下册），第55页，上海书店，1984年）。看来，蒙古高原此前曾迭为匈奴、东胡、突厥等所据，他们的社会文化形态必然给后起民族以深远影响，因而说蒙古族为各大族系混合的产物，似不无道理。

蒙古族兴起后，相继灭掉契丹族西辽（1216），女真族的金国（1234），进而灭掉南宋（1240），形成横跨欧、亚大陆的元蒙大帝国，统治中华大地100余年。

在蒙古族统治的100余年间，以及元蒙帝国灭亡，蒙古族退居大漠后，明王朝长期抵御蒙古族入侵的200余年间，今朔州又是蒙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元蒙帝国建立后，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改辽燕京为“中都”，四年（1267）迁都中都，九年（1272）改中都为“大都”，二十一年（1284）“置大都路总管府”，二十七年（1290）正式设置全国行政区，开始推行省（行省）、路（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建制，置中书省1个，行中书省11个，路185个，府33个，州359个，县1127个。中书省“谓之腹里”（《元史》，卷58，《地理志一》），属政权统治中心地带。当时，今山西全境及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皆属中书省辖区，设“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及“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管辖（《元史》卷91，《百官志七》；卷86，《百官志二》），治所分别为今大同与太原。宣慰使司辖大同路，路治大同，廉访司辖冀宁、晋宁二路，路治分别为今太原与临汾。今朔州地区之朔、武、应诸州即为大同路所辖属。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以南京为都建立明王朝，“建元洪武”（《明史》，卷2，《太祖纪二》），是为明太祖。当年闰七月，明将徐达北上攻取大都，推翻元蒙政权，随之挥师沿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下西向进逼太原，平定山西，统一全国。于是，镇守太原的元将扩廓帖木儿即“引兵出雁门”，欲乘徐达南下收复大都。扩廓行至保安（今河北保安），徐达遂“乘敌不备，直捣太原”，扩廓还师回救，徐达遂乘势“夜袭其营”，“尽降其众”，扩廓仅“以十八骑走大同”（《明史》，卷125，《徐达·常遇春传》）。洪武二年（1369）正月，徐达副将常遇春取大同，今朔州等晋北地区遂为明据有；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击败之”（《明史》，卷2，《太祖纪二》）。当时，常遇春卒，李文忠继任徐达副将，徐、李二将正奉诏挥师攻庆阳（今甘肃庆阳），“行次太原，闻大同围急”，文忠遂“出雁门，次马邑，败元游兵”，擒元将刘帖木，进而至马邑西北白杨门，乘夜安营以待，晨起与之激战，“大战之，擒其将脱列伯，俘斩万余人”（《明史》，卷126，《李文忠传》），大同解围。随之平定山西，统一全国。

明王朝统一后，元大同路所辖晋北地区遂成为抵御蒙古族入侵的北部边防重镇。

明代前期，洪武、永乐年间太祖与成祖曾多次遣将或御驾出雁门北上征讨，重创了元蒙势力，迫使其遁居大漠草原和东北等地。但“元人北归，屡谋复兴”，极力图谋复辟元蒙统治，严重威胁明王朝安全。尤其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明史》，卷7，《成祖纪三》），都城迁往北京后，山西处于“上游之势”，故“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晋北更与京师安危治乱息相关联，形势尤为严峻。诚如史家所述：“元人北归，屡谋复兴。永乐迁都北京，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明史》，卷191，《兵志三》）基于此，自洪武初年即大力加强这里的边防建设，修长城，沿长城险关要隘建军镇，屯驻重兵镇守。洪武六年（1378），“命大将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明史》，卷191，《兵志三》）。进而，陆续沿长城线设置九大边防重镇，称“九边”：“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由是“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史》，卷191，《兵志三》），“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明史》，卷89，《兵志一》），每边各设数量不等的卫、守御所和堡塞，组成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这军事防御体系中，大同边是正面进攻的前沿，地位尤为重要。它“东起天镇县东北的镇口台，西到偏关东北的丫角山，长1086里，属8卫、7所、583堡”，“驻军数超过12万人”（《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第380页，385页，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今朔州之地是大同边南面的军事据点，故设“朔州卫”屯兵驻防。

明代前期，当“洪（武）、永（乐）、宣（德）世，国家全盛”，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有力屏蔽了北部边防。进入明中期，国势日渐衰颓，对蒙古族转为消极防御，蒙古族势力日益强大，入侵日趋加剧了。故自“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蒙古族）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明史》，卷327，《外国八·鞑靼传》）。

元蒙势力北遁后，在明初太祖、成祖的沉重打击下发生内乱，永乐初年后，逐渐分化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

“鞑靼，即蒙古，故元后也”（《明史》，卷327，《外国八·鞑靼传》），为成吉思汗直系后裔，被视为蒙古正统，居于大漠南北。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明史》，卷328，《外国九·瓦剌传》），为蒙古别部，居于漠西天山南北，亦称西蒙古。

“兀良哈”：“朵颜、福余、泰宁，高皇帝所置三卫也”（《明史》，卷328，《外国九·瓦剌传》）。亦为蒙古别部，居于大兴安岭南麓朵颜山和嫩江流域一带，明太祖曾于此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合称兀良哈三卫，或称朵颜三卫。

明英宗正统年间，瓦剌部“日益强大”，漠北诸部“俱属焉”，“复胁诱朵颜诸卫，窥伺塞下”，蓄谋策动南下入侵了。正统四年（1439），也先继位首领后，“北部皆服属也先”，进而“破兀良哈”，并为向明王朝“邀索中国贵重难得之物”而“辄造衅端”，明边将皆知其“必大为寇”，屡上疏警示朝廷，昏庸的英宗毫无所动，仅诏示“防御而已”，终于酿成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分道大举入寇”，“也先自寇大同”（《明史》，卷328，《外国九·瓦剌传》），进而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围困明军、俘虏英宗的“土木之变”惨剧，明王朝由此急剧颓败下来。

明武宗正德至世宗嘉靖年间，继瓦剌而起的鞑靼部入侵进一步加剧，“边备废弛”的明王朝尤处危亡险境，终于酿成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首领俺答进围北京，骚扰京畿，明王朝几近覆亡的“庚戌之变”。这期间，军事重镇大同边不仅无力抵御蒙古铁骑侵扰，反成屡遭掠抢践踏的灾难之所。

请看正德年间：

四年（1509），“敌数寇大同”。

八年（1513）夏，“（鞑靼）小王子数入寇，夺掠尤惨”；“复以五万骑攻大同，趋朔州，掠马邑”。

九年（1514）秋，“敌连营数十，寇宣（府）、大（同）塞，而别遣万骑掠怀安”，“京师戒严”；进而“逾怀安趋蔚州，至平虏（鲁）城南”。

十二年（1517）冬，“小王子以五万骑自榆林入寇，围总兵王勋等于应州”；“是后岁犯边”。再看嘉靖年间：

五年（1526），“犯大同及宣府”。

七年（1528）春，“掠山西”；夏，“入大同中路”；冬，“复寇大同”。

十三年（1534）春，“（鞑靼吉囊）”，“寇大同”。

十五年（1536）冬，“（吉囊）复犯大同，入掠宣、大塞”。

二十年（1541）秋，“大举内犯”：“（鞑靼）俺答下石峪关，趋太原”，“吉囊由平虏卫入掠平安、寿阳诸边”。

二十一年（1542）夏，“入寇，掠朔州，抵广武，由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长子皆被残”，“复入忻、崞、代而北，屯祁县”，后“遂从雁门故道去”；秋，“复入朔州”；这年，“吉囊死”，“俺答独盛”。

二十四年（1545）秋，“俺答犯延绥及大同”。

二十八年（1549）春，“犯永宁、大同”。

二十九年（1550）夏，“犯大同”；秋，“南下至古北口”，“大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畿甸大震”，“焚掠三日夜，引去”。这便是明王朝几陷覆亡的“庚戌之变”。之后，入侵尤为加剧。

至穆宗隆庆四年（1570），经时任大同总督的王崇古交涉，“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双方缔结“互市”通商协议，俺答始“约束诸部无入犯”，且“岁末贡市，西塞以宁”，边境保持了短暂安宁。

然而，“神宗即位，频年入犯”（《明史》，卷327，《外国八·鞑靼传》），时隔仅三年，神宗万历皇帝即位后，鞑靼入侵的边塞烽火重又点燃。直至思宗、崇祯年间，“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明王朝终于在蒙古族南侵、女真族满清东进和李自成义军北上的夹击下寿终正寝了。

这就是说，自明王朝取代元蒙政权至明亡，大同边所属朔州卫等地又长期成为蒙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至此可以说，数千年竞相崛起的北方各方民族，匈奴、东胡、突厥、肃慎、蒙古等族及其各部族，几乎无一不曾频繁活动于马邑古城这个历史大舞台；数千年来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一幕幕历史活剧，几乎无一不曾在这里频频登台上演。